**王安石变法——三位旷世奇才的“争斗”**

 王安石变法，可谓是北宋年间最为轰轰烈烈的政治变革，准确地说，应该是一场残酷纷乱政治斗争，最终耗尽了北宋从开国皇帝赵匡胤以来所积累的所有国力。王安石变法当中被贬官员之多，斗争之“惨烈”，前所未有，甚至最后连变法的发起者王安石也难逃落魄离京的命运。

 三位旷世奇才之中，第一个要谈的自然是《苏东坡传》的主角苏轼，苏轼凭借着自己惊人的才学，年纪轻轻进京和弟弟与父亲应考的时候便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名声大噪，以至于当时的皇帝宋英宗直接称赞自己给后代选好了两个宰相。但是苏轼的一生的黄金时期都深陷王安石变法的政治斗争当中，空有宰相之才，一身官路坎坷。“问汝平身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正是苏轼垂暮之时的悲叹。苏轼刚正不阿，心底善良让他在纷乱的政治斗争当中总是陷于被动。或许这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哀吧，一个德才兼备，千古难逢的伟人却一生经历种种磨难。

还有两位旷世奇才，也就是王安石变法当中的变革派和保守派的代表人物-王安石和司马光。王安石是历史上颇具争议的人物之一-一个励精图治，满腹经纶，清贫刻苦的改革家，同时也是一位固执己见，不修边幅，激进乃至疯狂的理想主义者。王安石绝对不是小人、奸臣，相反他也是一个有抱负有追求的儒士，但是他的性格注定了他一生的夙愿最终落空。司马光也可谓是千古奇才。司马光有着和苏轼和王安石一样的伟大抱负，同时他的生性正直，从幼年砸缸救人再到为官时候的忠正，足见他伟大的儒生形象，但是他又过于保守，后期担任宰相的时候对于新法的改正也有失偏颇。

这场变法的坚定的支持者-宋神宗，也绝对是一个有抱负，励精图治的好皇帝。他之所以支持王安石，就是因为他内心想要建功立业的追求非常强烈。因此就此来看，如果不翻看史书上记录的残酷结局，或许我们都会以为这将会是一场成功的变法-积极上进的皇帝；富有地方变法经验，刚毅刻苦的王安石；刚正不阿，忠厚聪慧的司马光，以及拥有闪耀千古的才学和智慧的苏轼。

他们四人本有希望一起开展一场成功的变法的。而且撇开争斗，三人私下其实是惺惺相惜的。司马光在苏轼的父亲苏洵怒写《辨奸论》痛骂王安石的时候，替王安石辩解，王安石死后司马光还给予王安石很高的评价。苏轼在王安石失势，自己同党司马光等人得势的时候居然替王安石新法可以借鉴的地方辩护，在南京遇到王安石的时候还畅谈甚欢。而苏轼与司马光虽说后期的时候有了一些过节，但是司马光去世的时候苏轼洋洋洒洒写了3000字的墓志铭褒奖司马光。因此三人合作共赢的基础是有的，王安石本可以更为温和地推行变法，听取司马光和苏轼等仁人志士的意见。但是王安石的固执与偏激自负，担任宰相的时候为了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惜排挤能臣，任用小人（这些小人最后也把王安石害得很惨），强制力疯狂变法。最后一切破灭，三败俱伤，国力消耗殆尽，印证了苏洵在《辨奸论》里面的咒骂。也许苏轼晚年再看父亲的文章的时候，会深感父亲的睿智的判断吧。

其实回首整个王安石变法，对于新旧法的得失最为明白的还是苏轼，苏轼在王安石得势的时候坚决批判新法的“保甲制”以及“青苗法”实施时候的种种恶行，在司马光得势的时候又意识到旧党弊病之繁多不亚于新党，劝诫司马光采纳新法当中的“免赋制”等等，但是也均不被采纳，还导致同时得罪新党旧党，夹在其间，身世飘零。正如林语堂所说的，苏东坡是大事智慧小事傻，苏东坡对于国家政治弊病的判断，对于人生富有智慧的思索，足见他的智慧。但是在政治斗争上，苏轼几乎是一个“白痴”，在那个政党斗争盛行的年代，像苏轼这样“站位不明确”，“处处得罪人”的人，必然处处受到排挤。因而正如前文所说，苏轼的悲哀是那个充斥政治博弈的时代的悲哀-真理被朋党之争掩盖，社会在政治斗争当中凋零。正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黑猫白猫，只要能抓耗子的都是好猫”，远离政治斗争，以真理作为治国的标准，共同为国家的发展建言献策才是良好政治生态的表现。王安石变法，既是北宋的悲哀的缩影。也是对后世深刻的警告。